

□ 粤港澳大湾区的清华人

前进的道路上挥洒汗水，奉献热血和才智，深研院所取得的每项成绩，都让我们内心充满成就感和幸福感，我经常在院刊《清芬报》上赋诗，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感，《南国紫荆亦芬芳》就是其中之一。

根系清华，雨露阳光，
立足深圳，谱写华章。
莘莘学子，来自八方，
深研博学，为国争光。
清华精神，光大发扬，
为学为人，厚德自强。
创业创新，奋发向上，
紫荆盛开，南国飘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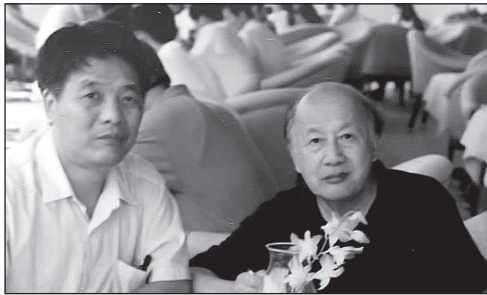
这首小诗被深圳大学的音乐老师谱曲，作为院歌被深研院师生传唱。

最后，我要感谢清华大学领导对我的信任，感谢清华相关院系对深研院的大力支持，感谢深研院这个团结奉献的领导集体，感谢在创建深研院过程中共同奋斗的全体教师和工作人员。感谢深圳市的大力支持，在院长卸任前我根据深研院科研用房严重不足的现状，向深圳市提出再建设10万平方米科研用房，需5亿建设经费的申请。此报告获得深圳市全额批准，现在能源环境、海洋科学、信息技术3座大楼拔地而起并投入使用。

长江后浪推前浪，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发展得越来越好，现在已更名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新起点、新机遇，我为仍在深研院继续拼搏的同志们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粤海门幻想曲

○许安之（1965届建筑）



20世纪90年代初，许安之（左）和深圳大学建筑系创系主任汪坦先生合影

1985年的一天，我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收到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学叶如棠的来信。信中说：“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要我推荐一位建筑系主任，我推荐了你。”

信的最后还提到，他即将到城乡建设部工作，不胜惶恐。后来我从《人民日报》海外版得知，叶如棠被任命为城乡建设部部长。

浙江大学是中国的名校，浙江又是我的家乡，按理说我应该回浙江执教。但是，此前不久，我已经答应了深圳大学党委书记罗征启，他邀我回国后去深圳大学工作。我想，既已答应不能失信。还有一个原因，我曾看到深圳大学张维校长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报道，深圳大学实质上是中国的一所实验性大学。清华是深圳大学的主要援建学校，清华母校的情结也起了作用。我很快给叶如棠回信，说明了



2020年1月，许安之夫妇（左2、右1）拜访罗征启老校长（左1）和梁鸿文老师（右2）

原因，感谢他的好意。

那时人才流动尚未放开，调动工作很难。我1986年8月回国，按照老罗信中之建议，经香港直接到深圳，先不回原单位。后来学校和我本人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到1988年初才办成调动。我终于在深圳大学的校址——粤海门落户。

1988年的11月，乐民成学长（1955届建筑）由于健康不佳，学校要我主持建筑系和建筑设计院的工作。深大建筑系自1983年建校时开始招生，第一位系主任是创校校长张维邀请的汪坦教授，第二位系主任是李承祚先生。实际上，罗征启学长是清华建筑系1955届的，他的夫人梁鸿文学长是1959届的，他们也是主要创建人。

我接手系和院工作时，由于还是初创阶段，各方面的条件并不好。记得1988年我的平均月收入是人民币670多元，个人收入不高，系和院的经费也有限。但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才问题。为了引进和培养人才，我们花了不少精力。1989年初，我系和院在《建筑学报》刊登招聘广告，这可是《建筑学报》首次刊登招聘类广

告。结果收到160多份应聘材料，最后经过系院联席会议审议，决定邀请三人来系和院共同创业，其中结构专业是傅学怡，清华土木系1968届校友，他后来成为“水立方”的结构总设计师。建筑学专业是费晓华，规划专业是陈一新，他们都是同济大学的硕士，那时我国第一位建筑学博士还没有出炉，现在他们都是深圳市很突出的专业人才。由于当时人才制度的缺陷，两位同济人在深大工作了三年也未能调入深大，只好选择到深圳市发展。

在特区办学要具有改革开放的特色。1989年后，虽然我国和我校刚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政治风波，我们仍坚持改革开放，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和香港的很多著名建筑师参会，使师生们开阔了视野。

90年代初的一天，张维老校长来校，校方让我去接待。我到了学校领导办公室，见到了张老校长，他正在和校领导一起谈论，我听到他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深知老校长此时此刻重提梅贻琦老校长名言的深刻含义。从校领导办公室出来后，我陪同张维老校长到附近的蛇口和华侨城等地参观，并在华侨城一个二星级酒店的二楼窗口边的餐桌上一同用了午餐，我向他汇报了建筑系发展的近况及下一步的设想。用餐处虽没有包厢，但很安静，窗口能看到“锦绣中华”景区。我知道老校长有一位比我低两届的学建筑的女儿，但不知道他有位叫高晓松的外孙。2000年后的深圳大学一次重大校庆，已是名人的高晓松捧着他外公的胸像雕塑送到了深圳大学。此是后话。

几年深大工作让我逐渐感悟到，深

圳大学并不是我幻想中的“中国实验大学”，实际上是深圳市的“市立”大学。1991年，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做设计有兴趣，就向学校打了辞职报告，但没有得到批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可能接替我的人选。我找到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作的老同学马国馨，他本人认为可以考虑，但熊明和吴德绳两任院长都不肯放。

后来谈过的还有项秉任、张永和（后任耶鲁大学建筑系主任）等。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来深大。倒是有位年轻的学弟马清运，拿着清华李道增院士的推荐信来“自投罗网”，他是清华建筑系1986届毕业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深造后在有名的KPF设计公司工作过，很有才华。我觉得他锻炼几年后是接替我的合适人选，就任命他为院长助理。工作了三年后，由于他的家人不愿意来深圳，他就去了上海。他后任美国南加州理工学院的建筑学院院长。

1992年，深大建筑系和设计院遇到了一次国际“建筑大赛”的机会。那时对外经济贸易部在深圳地王大厦南还有一块10万平方米的用地，准备建设一个与上海金茂大厦相似的姐妹项目——中国深圳对外贸易中心。我邀请美国SOM和我系我院共同参加该建筑的设计投标，很快得到SOM的响应，派来了两位设计师，一位是布莱恩·李，当时38岁，是一位设计能力超群的美籍华裔建筑师。我方也派出了多位设计人员，其中结构专业有傅学怡，建筑有龚惟民等，艾志刚还推荐了孟建民（非深大员工）也参加了设计团队，由我对联合设计团队总负责。双方设计人员付出了近三个月的努力。

很快，评审结果揭晓，23位评委一致

选出深圳大学建筑设计院与美国SOM联合设计的方案为中标方案。主塔楼高88层，集办公楼、五星级酒店、会议展览、商业等多功能的大型综合体，地上总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以上。《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以“深圳再建全国最高楼”报道了这一中标消息。不久，当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在深圳听取了我的设计汇报。外经贸部派了一位总经理负责此项目。香港李嘉诚愿投资50%，并邀请中方项目总经理和我访问香港。

在方案联合设计期间，我曾将布莱恩·李请到我的办公室，我说：“我想请你来担任系主任并兼做设计工作，所以想了解你的收入，看我们能否保证你在这里工作，收入又不降低。”他说：“SOM的规则是上级知道下级的收入，下级不能知道上级的收入。和我一起来的助手也不知道我的收入。”接着他告诉我，他目前的年薪是8万多美元。我想，只要深圳外贸中心的项目中标并落实，一定要请布莱恩·李来任建筑系主任兼项目主设计师。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和外经贸部属下的中外运公司签了合作协议，各占50%股份，他携其长子李泽钜等来深参加了签字仪式和隆重的庆祝酒会。酒席前，我和李嘉诚第二次见了面。签字仪式的新闻再一次登上《深圳特区报》的头版头条，本以为项目毫无悬念了。但是，虽然签订了协定，李嘉诚一直没有下决心真正投入资金。我对外经贸部的项目总经理说，你们这块宝地虽然“名花有主”，但实际上是“订婚不结婚”，或者是不急于“结婚”。我们很无奈。

深大的设计组和长江实业公司指定的香港一家交通研究所及刘荣广建筑师一

起，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该项目的周边及内部交通等问题。到1994年，李嘉诚把该项目负责人陈悦明调到北京负责“东方广场”的开发。陈悦明曾对我说：“李先生对东方广场项目非常重视，我每星期两次从北京飞回香港直接向李先生汇报项目进展情况。”1995年，李嘉诚将他的香港希尔顿酒店拆了，在原地动工建起了香港最高楼——“长江集团中心”。我知道，我的“幻想曲”的这一乐章结束了。“中国深圳外贸中心”项目后来由外经贸部转给了香港华润公司，后在原地块建成了著名的“深圳华润万象城”。

1993年1月，中国建筑学会因多次申办在北京举行国际建筑师大会没有成功，为了扩大宣传和沟通，时任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的叶如棠邀请国际建筑师协会（UIA）理事会在深圳开会。我派了几位英语和设计都较好的建筑系学生协助做会务工作。其中一位叫张之杨的同学后来还进了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深造。会议之后，学会让我负责编写1999UIA北京大会的申办书，我请平面设计师龙兆曙设计UIA大会会标。

1993年7月，第18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芝加哥召开，主题是“设计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代表大会将投票决定1999年的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哪个城市召开，程序和申办奥运会一样，这次又有好几个城市和我们北京争。我到得晚，但感觉会场气氛有点紧张。学会秘书长张祖刚（1956届建筑）看到我，要我赶紧给哈克尔（美国）和哈克尼（英国）做做工作。我和这“两哈”近年来已建立了些私人情谊。哈克尔当时是国际建筑师协会的第一副主席；哈克尼是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前任主席，虽然

已退下来但仍很活跃。我估计，他们两位能影响的选票数会有近百张，整个代表大会有选举权的选票一共200多张。我在会场分别找到了他们，转达了中国建筑学会的迫切希望，希望这次申办能取得成功，还告诉他们申办书是我编写的，等等，两位均表示了支持。

第二天下午投票。中午，韩国建筑师学会还在设宴会，招待下午参加投票的代表。下午第一轮投票未产生得票超过半数的城市，第二轮北京就胜出了。中国建筑学会申办成功，那一年，北京申办奥运没有成功，国际建筑师1999年大会的申办成功，也算是一个小安慰。

建筑系最重要的“产品”是学生。1994年，香港实业家胡应湘赞助建深圳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我将设计任务交给了毕业班设计成绩突出的祝晓峰同学，他出色地完成了设计，毕业后留在设计院，在黄莘南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施工图。1996年，国际建筑师大会在巴塞罗那举行，我派他去参加，是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后来他被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录取，成为第一位进哈佛深造的深大毕业生。

学科建设是办学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深大建筑学学科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B级）。按省高教厅的解释，A级为国家重点学科，B级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培养对象，当时建筑学专业全国已有百所以上大学办，但全国重点学科只有清华和东南大学，所以B级重点学科已是新建院校和专业的理想目标。

1996年，深圳大学推行“学院制”。按照学校的计划，建筑系和土木工程系联合成为学校第一个学院。主管深圳大学的副市长武捷思约我谈话，时任市府副秘书长

□ 粤港澳大湾区的清华人

长的江谭瑜也在座，谈了很长时间。我说我已做了三届系主任和设计院院长了，还是想搞设计工作，能否在全球招聘学院院长？武副市长认为可以，但我这提议“远水解不了近渴”，就这样，我开始了在深大的第四个任期。

1998年，北京举行了又一次建筑“国际大赛”——国家大剧院设计国际竞赛。我带了我系我院的傅学怡、杨文焱、段敬阳、曹卓等设计人员参加。我们的方案构思较独特，具有现代建筑的形式及中国文化的内涵。当时国内外共有40多个方案，在天安门广场旁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公众展出，我们的方案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得到了最多的选票。后来国内外共有9家设计单位进入第二轮竞赛，深圳大学是国内4家入围的设计单位之一。对于第二轮竞赛，是重新构思还是在原方案上改进，这是首先必须面临的选择。当时我认为既然原方案受到大家的喜欢，就不要辜负了公众，因此选择了在原方案上改进，并向评委们汇报和回答了问题。后来怎么选中法国建筑师的方案并实施的，过程就不清楚了。

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叶如棠主持，李瑞环等讲话。那年的代表大会上，鼓掌通过了中国建筑学会推荐我接任国际建筑师协会职业实践工作委员会（UIA PPC）联席主任一职，另一位主任由美国建筑师学会推荐的人选担任。2005年我因健康原因，推荐由清华大学的庄惟敏教授接任。

90年代初，万科最早的地产项目——深圳“威登别墅”找我院设计，可惜当时没有抓住机遇。事隔多年后的1998年的某一天，万科集团下属的策划公司——万创

公司总经理夏南和万科集团总经理姚牧民来我院谈项目。我和他们一起去看了深圳梅林关外的一片地，姚总说万科准备在这里盖一座城，这就是深圳万科四季花城，深大建筑设计院参与了从首期到第四期的设计。1999年夏，万科希望我在世界建筑师大会期间安排大会执行主席叶如棠和王石会面。经联系在京见面后，叶如棠对王石说：“许教授说你们在深圳要搞一个面向普通人的住宅项目，我非常支持。”

2000年，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我在自己兼任社长的《世界建筑导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一世纪家园：沿轨道上班和回家》的文章，提到我国大城市迫切需要轨道交通，提到轨道交通站点要与居住区紧密结合。那一年，万科邀我与王石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城房网”成立会议，实际上是一个房地产业联盟。王石任首任轮值主席。会议期间，我向王石建议，可否由多家有实力的房地产商联合起来包建一条轨道线做试验，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居住区开发有机结合起来。

那次会议决定推动“新住宅运动”，后来在深圳富临酒店又开了一次预备会。会上王石提议我起草“新住宅运动宣言”，我没敢接此任务，我觉得从现代建筑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提法不是很确切。但我还是积极参加了万科组织的在上海举行的“新住宅运动”会议，并在会上做了推动轨道交通及其社区建设紧密结合的发言。

2004年，我和两位中青年建筑师成立了建筑设计事务所，“半身下海”，人生新体验，后因健康原因退出。2005年，我的最后一名研究生从深大毕业，至此，正式结束了我长达19年的“粤海门幻想曲”。